

March 2016

David Harvey's Interpretations of Space in French Literature

Jin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Jin. 2016. "David Harvey's Interpretations of Space in French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2): pp.92-10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2/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戴维·哈维对法国文学空间的解读

刘 进

摘 要: 戴维·哈维是西方“空间转向”中实现地理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遇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其空间观念在身体论、现代性与文化艺术的三重维度上展开。在哈维的空间理论的文化艺术维度上,他对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国文学的关注和批评实践开启了一种通过空间批评来展开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批评立足现实、立足批判的新平台。

关键词: 空间转向; 戴维·哈维; 空间批评; 法国文学; 巴黎

作者简介: 刘进,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研究”[08XWZ002]结题成果的部分内容。电子邮箱:chuanrenliu@163.com

Title: David Harvey's Interpretations of Space in French Literature

Abstract: David Harve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gures who mingle traditions in geographic research and Marxism in the “spatial turn.” His idea of space is developed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ontology, modernity and art. In the dimension of art, his criticism practice of French literature centered on Paris opens a new horizon for spatial criticism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it also builds a new platform for realistic critical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spatial turn; David Harvey; spatial criticism; French literature; Paris

Author: Liu Jin,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ry Studie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with academic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E-mail: chuanrenliu@163.com

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空间转向”,蕴含着三重彼此关联的维度: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转向”,即从破除时间与空间二元对立与历史决定论传统的角度去探讨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问题;二是现代性视域中的“空间转向”,主要关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全球化兴起之后空间观念的改变以及时空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维度是文化艺术之维的“空间转向”,这一维度的“转向”意味着伴随着前两种“转向”,特别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带来的“空间转向”而出现的文化艺术上的“空间转向”,这一层次的“空间转向”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文化表征而出现的,一方面对应着“后现代主义”

文化表征,一方面对应着文化艺术批评领域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同时,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一定意义上,对空间的重新阐释和理解进而形成不同于传统的空间观念,是在西方现代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中完成的。“空间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资源的大量借助或者说因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推动和参与而最终形成了对空间具有马克思主义风范的全新诠释,在这种全新诠释中,文学艺术同样成为其重要的关注对象。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1935 -)就是实现这种“相遇”并体现“空间转向”三重维度的关键性人物。本文将在清理哈维空间理论的三重维度形成的基础上,探

讨其以“巴黎”为核心对法国文学展开的空间批评。

一、哈维空间观念的三重维度

戴维·哈维著述丰富且涉及的主题和领域庞杂,但贯穿其思想主题核心的关键词是“空间”。

作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家,哈维的空间理论起步于他对地理学传统的改造。在哈维之前,作为哲学家的勒菲伏尔等对空间从本体论角度进行了深入的重新阐发。尽管与之不尽相同,但哈维在对地理学的改造中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哲学与方法论的重要性。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的序言中,他清理了“计量学”传统,认识到“计量革命”所蕴含的“哲学革命”,从而认识到地理学研究中科学方法与哲学理念的重要性。基于此,尽管哈维自己强调其《地理学中的解释》“重点主要在于方法论的问题”,但又明确申明:“我们对于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15)。在哈维看来,地理学家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信念和价值判断上的,也是依赖于符合逻辑的合理性论证基础上的,前者需要地理学家具有哲学家的“理论思索和价值判断”,后者需要地理学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严密推理与解释。哈维所理解的哲学是“信念”、“生命观”、“生活观”,而这构成了“地理学的哲学”。因此,哈维对哲学的强调,从根本上是对地理研究中的价值信念的强调: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他的社会良心,指出加尔各答街头的饥荒和悲惨境况,以此来设法转变他,使他认识到地理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绪,使他踟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我们只能以这类

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地理学中的解释》10)

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哈维对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其不同凡响之处,并已经预示着其学术思想继续前行的轨迹:对方法论的坚守展示出哈维这一时期的思想当然还是偏向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但以信念价值为核心的哲学立场则又体现出其对地理学、对空间问题的探讨必然会与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关联起来,同时必然会走向实证与思辨的调和;而他对“社会良心”与“景观随时间变迁”的敏锐艺术感,则已经显露了他后来在《社会正义与城市》《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的思想萌芽。《地理学中的解释》在对“空间”概念进行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物理学的考察基础上,极力彰显空间概念的“多维性”:

不去参照特定文化在语言、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展的空间概念,就想理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关于空间的地理学观念因此被深深地置于某些较广泛的文化体验之中。[……]“空间”一词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对待,且空间概念本身就是多维的。[……]无论是为了哲学目的或经验研究的目的,无需对空间概念本身持一种僵硬的观点。概念本身可以看作是灵活的——可以用特定的关联域来确定,可以用特定的方式使之成为符号,可以用各种空间语言使之形式化。这种灵活运用需要谨慎对待。但它也以一种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方式为发展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挑战和机会。(《地理学中的解释》274-75)

这段论述预示着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实证主义”阶段的哈维对空间的理解已经开始摒弃实证主义而追求科学与哲学的调和:一是空间概念植根于广泛的“文化体验”之中,空间概念是灵活的,需要在“关联域”中确定;一是空间可以“符号化”。这两点又是彼此联系的,共同体现出哈维力求在科学计量和实证基础上追寻统一的哲学基石上的科学方法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空间探讨

路径。

19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主导性的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使哈维对统一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石的追寻显得更加明确,而这种追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从而实现了地理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相遇”。在哈维的这一创造性相遇中,他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性改造,也实现了对地理学传统的根本性变革,从而推动了“空间转向”潮流更加明确地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空间转向。概括而言,哈维的空间理论从三个方面体现了西方“空间转向”潮流的三重维度。

首先,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空间是灵活的、是“关联域”和“文化体验”中的理解进行了改造,提出了“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的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那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认为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存在差别,而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正是弥补这显现得不同的两种(事物)和矛盾的分析模式之间的思想裂痕的时候[……]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区别常被认为是幻想而非真实,但[……]这种区别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空间形式不能被看成社会过程中发生的无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容纳”社会过程的事物,就如同社会过程也同样是空间形式一般。(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302-03)

在此,哈维不仅如同“空间转向”中的其他理论家那样改变了空间对时间的依附地位,将空间和社会共同看作是人类生存的本体,而且还将空间与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将空间形式与社会过程看作是一体化的。其中,哈维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这一统一体彰显了空间对社会以及社会对空间的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如同卡赞尼尔森(Katznelson)所言:“尽管受到勒菲伏尔的激发,但是哈维完全拒绝了勒菲伏尔将空间关系视为一种独立的决定性力量的主张。对于哈维而言,空间不是一个类似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形塑(人们)又被人们形塑的社会维度”

(Katznelson 3)。当然,卡赞尼尔森对勒菲伏尔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值得探讨,但在一定意义上,勒菲伏尔建立了空间、时间、存在的三位一体的本体论,而哈维则更加强调了在此基础上,空间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动态“形塑”关系。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更加凸显了“图化空间”的意义:“社会关系总是空间性的,实践改变了知识体验的空间,其中制度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而想象是所有可能的空间世界的丰富源泉”(111-12),这十分明确地体现出哈维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论断的空间化解读,而这种解读本身又表明了哈维对空间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创造。综合而言,哈维力图建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关系阐释框架:

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也不是相关的,但它可以依据境况成为其中一种,或者同时成为全部三种。恰当地使空间概念化的问题,要通过与之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换言之,不存在由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答案——答案在人类实践之中。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要由“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了空间以及怎样利用对空间的不同概念化”的问题来取代。(Harvey “Space as a Keyword” 287)

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关系阐释框架的建立,为“空间转向”中形成的当代西方空间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经验与形而上的对立奠定了基础,而对空间与实践、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形塑”关系的深刻把握,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地理学“价值中立”的伪装,使得资本、权力、阶级、文化等要素能够与空间的生产联系起来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其次,哈维立足于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所谓“后福特主义”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一核心范畴,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展开了探讨。现代性关乎历史主义与时间性的问题,现代性问题天然地与空间性问题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哈维认为,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

消费——实现利润——商品扩大再生产”这一流程运转速度空间加快,这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同时,由于空间障碍因为高新技术的出现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而得以取消,因此,人们对空间距离的感知会变得越来越小。哈维认为:“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强调了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既定实践活动的易变性与短暂性”等等。其对“时空压缩”的表述凝练地体现为:

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主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朝着我们崩溃了。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和我们平常向我们自己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都有利于表明我所想到的这种现象。(《后现代的状况》300)

可见,所谓“时空压缩”一方面指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的缩短,即“使时间空间化”;另一方面指空间的收缩,即所谓的“地球村”,可称之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哈维认为,时间、空间以及时空关系的变化,对于理解现代性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性的核心正在于时空的演变,而这种演变同时也构成了现代性在全球流布的基本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时间和空间才会如此深入地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时空压缩”范畴的提出,体现出哈维空间观念的现代性维度。

再次,哈维的空间理论还涉足文化艺术的领域,体现出“空间转向”的美学维度。在2000年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哈维说:“其实我向

来就爱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从未想过把它用于我的研究中。一旦开始引用,我发现诗歌和小说能够使如此之多的历史观念得以阐明重现光芒。而有了这样的转变,一切就一发不可收拾了”(“Space of Capital”13)。在哈维的学术历程中,文学艺术一直是其关注的对象。自《社会正义与城市》起,哈维开始自觉地将文学艺术和审美体验与其对空间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写道:“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通过参照各种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就有可能写出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并理解这两方面已经经历过的各种转变”(哈维 255,409)。综观其著述,提香、马奈、契里科、康定斯基、劳申伯格、柯布西耶、蒙克、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后现代电影等,不时出现在他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展开的具体分析中。其研究试图从艺术家们所呈现的独特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中透视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

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空间解读中,哈维尤其关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城市空间体验,而这又尤以巴黎为最。关于巴黎,这座被誉为十九世纪首都的城市,历来不乏理论家对之进行深度解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本雅明。无论是他的“拱廊街规划”还是对“波德莱尔与现代性”的天才解读,都无不显示出巴黎这座城市之于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性。难能可贵的是,哈维摆脱了本雅明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他从空间批评的视角切入对法国文学与巴黎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在打破既有诸多成见的同时,也将考察的焦点上溯至巴尔扎克。在哈维的《巴黎城记》中,我们发现作为现代性样板的巴黎有其自身的成长演变轨迹,至迟到“第二帝国”时期才成为“十九世纪的首都”。特别是经历了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之后,巴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源于巴黎市长奥斯曼对巴黎的再造。同时,在这一时期中,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开始在巴黎出现,这便是金融资本主义,由此催生出的一种现代形态的消费文化也开始大行其道。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外观的改变和消费文化发展所推动的现代主义文化,使这一

时期的巴黎处处都充满着结构性的张力。哈维正是从对这些张力的分析和考察入手,开始其对法国文学的空间分析。在具体文学文本的选择上,哈维着重分析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波德莱尔和左拉。哈维认为,奥斯曼、马克思、福楼拜和波德莱尔全部都是在1848年以后才锋芒毕露的,而所有这些都受到巴尔扎克的巨大影响。哈维同意马克思关于巴尔扎克的看法,那即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整体来说已经预示了未来社会秩序的演变。巴尔扎克不可思议地‘预期’到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1830与1840年代还处于难以觉察的‘胚胎期’”(《巴黎城记》19)。在哈维看来,巴尔扎克通过《人间喜剧》这类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成功再现了那个充满着结构性张力的时代,细致、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一经确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和空间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同时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维对巴尔扎克的作用和地位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认为其对于马克思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才是对现代性最早的先知先觉者:

巴尔扎克为现代性的神话揭开面纱,让我们觉察到现代性其实是从复辟时期(Restoration)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所谓1848年后的激进断裂,其背后确实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即便是在文学生产领域,福楼拜和波德莱尔也在隐约中仰赖巴尔扎克所构筑的视野,从这点便可看出其中的连续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作品更是明确地表现出这种连续性。如果说革命运动利用的是既有秩序中潜在的紧张,那么,巴尔扎克所描写的1830与1840年代的巴黎就表现了这种本质。(《巴黎城记》19)

在这里,哈维明确否认了所谓现代性就是一种断裂的观点,哈维更加强调的是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而所有这种连续性的源头都由巴尔扎克所赐。在哈维看来,正是巴尔扎克构筑的天才般恢弘的视野,才为马克思、福楼拜、波德莱尔等后继者奠定了必要的认识框架。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维在对现代性、空间等问题做出马克思主

义的最新回应的进程中,较多地选取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对现代性以及现代都市空间的体验来展开,从而形成了他在文学领域的空间批评风貌。如同雷蒙德·威廉斯将城市看作是革命力量的“聚集”空间一样,哈维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发现“城市”一直是反资本主义的蓬勃之地:“城市化在世界人口空间组织中加速产生了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希望的空间》45)。下面我们将以其对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的批评为代表,来细致窥探哈维对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国文学的空间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视角下他对文学作品在呈现现代都市体验和都市空间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批判力量的发掘。

二、对巴尔扎克与法国文学中的现代性空间体验的解读

哈维认为,在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之前,巴尔扎克就已经解开了现代性的神话。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巴黎这座盛极一时的大都市开始变得愈来愈难以描绘和把握。其间如欧仁·苏等小说家就缺乏巴尔扎克式的解读和表现能力。巴尔扎克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巴黎为中心来展开的,巴黎在巴尔扎克的文学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分为了巴黎的、外省的、私人的、军事的、政治的以及农村的等诸多组成部分,但关于巴黎的叙述却是贯穿始终的。可以说,巴黎构成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一条最为主要的线索,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创造了一股公共舆论的气候,使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甚至是接受,不管是在无意之间还是勉强接受)现代都市生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则为第二帝国巴黎的系统性转变塑造出想象的前提”,其最大的成就在于“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去除了巴黎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去除了覆盖在巴黎之上的现代性神话,因此开启了新视野,这些新视野不只表现在巴黎是什么,也表现在巴黎能成为什么”(《巴黎城记》30)。在哈维的视域中,巴尔扎克是第一个洞察到巴黎是一座现代性之都的作家,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和城市的巨变,以及这种巨变背后的

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具体而言,哈维从如下几个方面揭示了巴尔扎克作品塑造的文学空间中蕴含的现代性体验。

首先,哈维从城乡生存空间的变化来揭示巴尔扎克作品中传统生活体验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反差,从而呈现出对现代都市体验的反思。哈维认为,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很多角色都是从艰苦的外省进入到巴黎,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其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即从艰辛节俭的外省生活方式转变为浮华奢靡的巴黎都市生活方式,如《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吕西安等都是如此。这种外省的生活方式在以巴黎为代表的都市生活方式面前是极为不自信的,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姿态出现的,它迫切需要融入到都市生活方式之中。而且这些角色,不管是“商人(如赛查·皮罗托)、野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如拉斯蒂涅),还是与权贵关系甚佳的女人(如巴日东夫人),一旦打进这个圈子,他们绝不回头,即便他们最终在巴黎失败而招致毁灭(如皮罗托与吕西安)”(《巴黎城记》36)。这实际上展现的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所带来的城乡分离以及城市施加给乡村的巨大压力与冲击。这也是哈维所述的时空压缩的一种体现,城市与乡村开始进入到一种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城市第一次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而现代性的逻辑也必须借助于城市这一舞台才能完成其穷形尽相的展演。对此,哈维进一步说:“对外省出身与外省权力的热切否认,演变成巴黎生活的创始神话:巴黎是个自足的实体,完全无需仰赖它所鄙视的外省世界”(《巴黎城记》38)。

在哈维的解读中,巴尔扎克作品中闲散的富有乡村生活气息的外省生活方式与繁华匆忙的巴黎都市生活之间鲜明的反差被突显出来。对于现代都市的日新月异、繁忙匆促、丑陋与不安,巴尔扎克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描绘,“不停地往前走并且从不休息”,它是一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运动、机器与观念的惊人组合,一座有着一千则各式罗曼史的城市[……]一个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在“巴黎的湍流中”,“事件与人群在杂乱地跌成一团。甚至连穿越马路都令人感到威胁”,每个人都“顺着自己的路线走,审视四周,一下子往这儿跳,一下子往那儿跳,不是怕沾到泥,就是为了赶时间,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其他人慌乱

地沿路狂奔”(《巴黎城记》38)。这显然是一种对时空压缩体验的淋漓尽致的刻画,尽管巴尔扎克还未能使用一整套全新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全面论述现代性的逻辑,但是他对现代性的体验却已经非常深刻和全面了。在哈维的批评中,巴尔扎克通过城乡空间变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住了现代性都市表面的喧哗与骚动,这为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根本逻辑与规律提供了文学体验的基础。

其次,哈维通过对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这一空间的独特性描绘,论述了作家对资本主义再造现代都市空间的独特文学化体验与描绘。巴黎有不同的区,而区与区之间是有严格的区隔的,这种区隔实际上也对应着阶级的区隔。巴尔扎克写到,巴黎将“它的头放在阁楼上,居住的是科学家与天才;二楼住的是装得满满的胃;一楼则是店铺,是腿与脚,因为忙碌的商人一直在此匆忙地进进出出”(《巴黎城记》46)。这样一种现代都市空间的再造实际上与道德秩序、社会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甚至说,通过这样一种空间再造,道德秩序与社会关系便深深地嵌入进了都市空间之中。哈维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化现代体验理论性地升华道:“空间模式不仅反映出道德秩序的再生产,而且也是道德秩序再生产的发动时刻[……]在历史的每个时期,上层阶级与贵族的巴黎都有着自己的中心,正如同无产阶级的巴黎总是有着自己的特定空间一样”(《巴黎城记》46-47)。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带来了对于都市空间的再造,而这种再造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现代性的逻辑,而且也将道德秩序、社会关系、阶级分化等全部揉进一种全新的空间模式之中。哈维对巴尔扎克的空間批评,深刻地展现了现代都市空间所蕴含的道德、社会和阶级元素,从而从空间平台出发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

再次,哈维细致分析了巴尔扎克作品所描绘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张力关系。外部空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空间模式,包括城市、街道、公园、拱廊街等构成的一种外在的物理与物质空间;而内在空间则包括人们的精神空间、情感空间以及审美空间等。这种全新的外在空间甫一出现,便给主体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类似于本雅明所述的“震惊”效果。通过这一冲击,主体的内在空

间被完全颠覆,然后按照外部空间的法则与逻辑进行重构。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批评,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他认为资产阶级无法有亲密关系以及内在情感,因为资产阶级将所有事物都转化成冷酷的计算以及利己主义,他们只在意货币的价值、虚幻的资本以及追逐利润”(《巴黎城记》52)。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角色包括《贝姨》中的克雷维尔、《朗热公爵夫人》中的公爵夫人等,这些人物的出现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外部空间的改变全面破坏了人的内在空间的结果。

在哈维的空间批评视角下,巴尔扎克的作品揭示了资产阶级内在的深层价值,破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神话。巴尔扎克虽然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发现资本主义最隐微的根本运行逻辑,但是却通过文学化的再现,将这一逻辑的外在表现形态给予了尽可能丰富和深刻的呈现。因此,哈维对巴尔扎克的空间批评不仅从一个崭新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巴尔扎克这一伟大作家的价值,而且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空间视野来施展批判力量的独特魅力。

三、对波德莱尔与现代都市景观的解读

关于波德莱尔与巴黎的关系,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写道:“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他天才的营养源泉。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不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本雅明189)。然而,在本雅明的描述中,作为“游手好闲者”的诗人所寻求“避难”的“人群”只不过是诗人想象的面纱,破除这层帷幕面纱,其后游荡的依然是幽灵般的城市。本雅明用同样诗意化的语言破除了波德莱尔诗意化、但的确是“异化的”对城市的“凝视”,揭示了城市空间并非诗人所想象的“风景”,而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商业气息。可

见,本雅明对巴黎空间的诗意化解读已经不是一种浪漫想象,而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分析与批判。但是,究竟城市空间的诗意化想象面纱之后的幽灵气息的根源何在呢?哈维对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的再研究开始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试图揭示城市空间最深层的秘密。

哈维对波德莱尔的重述是从对巴黎景观的深描开始的。哈维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权力逐渐让位于资本与商业这两个驱动城市极速变化的引擎。伴随着商业与资本的推动,整个巴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物理空间来说,首先是交通运输状况的极大改善。新铺设的碎石路面保证了运货马车和其他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与此相应的就是新的交通要道成为了一种新的城市景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都市景观:新咖啡馆、新百货公司、有娱乐节目的餐馆、马戏团、音乐厅、戏剧院以及全民歌剧院等。这些新的城市景观和设施的出现带来了大众娱乐的兴起。一些城市公园,如布洛涅森林和蒙索公园以及一些广场,如神庙广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民众社交和休闲的地方。这种转变带来的是私人财富的大量展示,群众的社交活动开始由过去的私密场所逐渐转移到大街上来,并从此接受商业法则和国家机器的监督与控制。

在这些新的都市景观中,哈维特别提到了新百货公司,正是在这些新百货公司中,商品本身才正式作为一种景观而出现,并日益显示其与日俱增的魔力与力量。哈维写道:

这些高周转率的百货公司需要来自巴黎各区的大量顾客,而新大道则促进了人潮的流动。商店橱窗成为引人驻足凝望的诱惑物。百货公司内堆置得高耸入云的商品本身便是一种景观。百货公司大门正对着街道,鼓励大众进到百货公司,即使光看不买也照样欢迎。大批接待员与推销员(特具魅力的年轻男性和女性)在百货公司内巡行的同时,也试着迎合消费者的欲望。这里面所牵涉的是露骨的性欲。不管此时的女性是担任买家还是卖家,其地位都远较过去来得吃重。(《巴黎城记》223-27)

在这里,哈维与本雅明一样,都注意到了百货公司这一新兴的都市景观带给大众的视觉冲击以及如何成为大众的欲望对象。新百货公司等对人的欲望的召唤与重构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后世诸如情境主义者对都市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百货公司相应的就是都市大道。在七月王朝时期,巴黎的大道就是作为重要的公共展示中心而出现的。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大道的功能被进一步强化。都市大道汇聚了以剧院、咖啡馆为代表的各种休闲娱乐场所,“使得大道沿线开展出许多展示资产阶级富裕、铺张浪费与女性时尚的空间。简言之,大道成了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公共空间”(《巴黎城记》227)。

哈维在对波德莱尔的重述中论述到,百货公司、大道、铁路等等新的都市景观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都市生活方式,这一方面给予波德莱尔以切肤的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也促使波德莱尔开始反思这种都市景观对民众内在心境的影响。哈维认为,“在某种近乎超自然的内心状态中”,“生命的深处几乎完全显露在我们眼前的景观中,不管有多平常,而景观也成了内在心境的象征”(《巴黎城记》228)。哈维注意到波德莱尔的《穷人的眼睛》所显示的现代都市景观之于单个主体的巨大冲击力以及由此生发的现代性体验。哈维评述道:“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显示了所有权、美学与社会关系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在公共空间控制上的争论点”(《巴黎城记》232)。哈维认为这种新的都市景观所营造出来的空间具有阶级性。比如咖啡馆,它既可以是完全的私人空间,也可能是公共空间,但是要进入这一空间,则必须要经过商业与消费主义的淘选,也即是说只有具有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人才可以进入。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阶级而言,咖啡馆就是一个排他性的空间。因此,现代都市景观绝非一种纯粹的景象,而是作家对世界的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蕴含的是不同而顽固的社会实践力量的交织与冲突。比如广大的工人阶级他们注定需要依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而男性工人一般都热衷于到小食店吃吃喝喝,当然也会到咖啡馆、舞厅、有娱乐节目的餐厅以及各类低档酒馆找乐子。而这种工人阶级长期占据的咖啡馆就会逐渐变成巴尔扎克所描述的“人民议会”。正是这种咖啡馆数量的急剧增长,保证了其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咖

啡馆也许对许多工人的生活来说是最稳定而可接近的空间”,但因为妇女、家庭等都未曾被排除在咖啡馆之外,因此,咖啡馆或酒馆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实际上扮演了“制度、政治与社会的角色”,哈维总结道:“简言之,工人阶级的连带关系是借由咖啡馆或酒馆为中心而以邻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同样,对工人阶级妇女来说,1850年代后激增的洗衣店也成了社会互动、亲密与连带关系、传递八卦及偶然冲突的中心”(《巴黎城记》233)。

在哈维的空间解读中,凸显出现代都市景观所营造出的各类空间本身就是各种权力、各层阶级所争逐的场所。总的来说,哈维在处理波德莱尔与巴黎的关系时,显然借助了本雅明的论述,但是哈维更加看重的是作为十九世纪首都的巴黎本身具体的都市景观以及这种现代都市景观对于主体的巨大冲击。在对这些景观的具体而微的分析中,哈维征用了其一直非常擅长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这样就使得对波德莱尔的论述显得更为公允、客观、中肯、深刻,并能够深入到城市景观空间中的最底层进行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批判。

哈维对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国文学的关注和探讨,以空间批评为基本视角,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为主要研究范式,揭开了19世纪法国文学与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复杂关联。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对全球时空的再造及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呈现方式的分析,哈维的空间批评不仅在“空间转向”潮流中成为最具魅力的一朵浪花,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星河中成为新近最灿烂夺目的一颗新星。哈维的批评实践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通过文学研究来探讨空间问题的新路径,开启了一种通过空间批评来展开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学批评立足现实、立足批判的新平台;这种新路径、新视野、新平台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新复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有力尝试;这种尝试不仅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转型,回应了西方“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展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关注西方现实的“空间转向”潮流的深刻推动;而这种推动从最深刻的内在理路上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立场和现实品格,为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

了典范意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Harvey, 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Trans. Gao Yongyuan, Liu Lihua, and Chai Yunl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Trans. Hu Da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Trans. Huang Yuwe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Trans. Hu Dap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1988.

——. “Space as a Keyword”,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Trans. Yanji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Katznelson, I.. “Forewor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y David Harvey. Oxford: Blackwell, 1988.

(责任编辑:王 峰)